

总结两代领导人思想理论与实践经验 再现改革二十年发展变化与辉煌成就

从邓小平到江泽民 领导的中国

江泽民
邓小平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从邓小平到江泽民 领导的中国

总 策 划： 吴智棠

总 主 编： 吴智棠 黄少群 叶庆科

上编主编： 吴智棠 叶庆科

下编主编： 黄少群 陶 克 周和平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责任编辑:冈 宁

封面设计:孙凤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邓小平到江泽民领导的中国/吴智棠等主编, -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4

ISBN 7-5006-2903-6

I. 从… II. 吴… III. ①邓小平-社会主义建设模式-思想评论②江泽民-社会主义建设模式-思想评论 IV. D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6753 号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北京市朝阳区小红门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1/32 16 印张 24 插页 310 千字

1998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6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印数 10,001 - 13,000 册 定价:26.00 元

总论：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胜利前进

本书定名为《从邓小平到江泽民领导的中国》，主要内容是反映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概貌，历史的跨度主要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的胜利举行以及不久后的江泽民主席的成功访美。在这将近20年的极不寻常的岁月里，我国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辉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总结近20年来的宝贵经验，把它集中到一点，就是坚定不移地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前进。

邓小平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近20年来，在中华大地掀起的这场波澜壮阔的改革，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的，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指导的。其实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第二次革命”。新的伟大革命实践需要新的伟大理论作指导，同时，新的伟大实践又为新的伟大理论的产生提供了条件。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正是经历了一个实践、

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样不断深化、提高、成熟和多方面展开的过程。从1975年的全面整顿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是邓小平理论诞生前的直接酝酿阶段。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是这个理论开始诞生和初步形成阶段。十二大正式提出了这个理论的主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十二大到十三大，是这个理论在全面改革中逐步展开和基本形成的阶段。十三大不仅阐明了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概念，并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方面以12个观点勾画了这一理论的基本轮廓，而且第一次提出这一理论是“指引我们事业前进的伟大旗帜”。从十三大到十四大，是邓小平理论全方位展开、走向成熟并经提炼概括而形成科学体系阶段。特别是自十三届四中全会形成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以来，经过十三届五中全会、七中全会及江泽民同志在建党7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和1992年6月9日在中央党校的讲话，全党对邓小平理论及其历史地位的认识更加深刻。党的十四大，第一次提出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概念，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概括了这一理论的主要内容及其贡献，第一次提出了“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的战略任务，确立了 this 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自十三届四中全会特别是十四大之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实践中，进一步丰富了邓小平创立的这个理论，并多次鲜明地提出了“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的旗帜”这个标志党的奋斗方向和改革开放形象的口号，还直接明确地指出这一理论“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旗帜问题，跟指导思想、精神支柱问题，实质是一码事。党的十五大最重要最根本的历史性贡献，在于明确地把这个理论定名为“邓小平理论”，并在党章中把邓小平理论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列为党的行动指南。这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更宽广的视野从更高的层次上对这一理论做出科学概括的标志。

从前，党的七大树立和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确定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现在党的十五大树立和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把邓小平理论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具有同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的这种科学性及其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已为近20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所证明，也为亿万人民从比较中获得深刻的鉴别和真知。有比较才能鉴别。首先，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的纵向比较。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20年，虽然建设有很大成就，但总的说来，由于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得太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快、不稳、不协调，人民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更使我们蒙受巨大的灾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近20年，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

的改革，就其引起中国社会变革的广度和深度来说，开始了一场新的伟大革命实践。这场改革，使中国（1）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2）从墨守传统的僵化体制转到了实行全面的体制改革；（3）从停滞封闭转到了全方位的对外开放；（4）从过分集中的计划经济转到了发展市场经济；（5）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到了实行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6）从强化集权政治转到了建设民主法制；（7）从思想禁锢转到了思想解放；（8）从鄙薄知识、轻视和摧残人才转到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9）从大搞政治运动和群众运动的治国方略转到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性发展战略；（10）从经济发展的长期曲折和大起大落转到了持续高速稳定和健康有序；（11）从人民生活长期处于贫困线上转到了脱贫奔小康进而向更富裕的目标迈进；（12）从世界范围的“战争与革命”论转到了时代主题的“和平与发展”论。如此等等。总之，这场改革，给社会主义中国带来蓬勃生机，整个中国从思想观念到社会生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的变化是前所未有的。中国发生如此巨大、如此广泛、如此深刻的变化，堪称本世纪以来在中华大地上发生的最伟大的历史性巨变之一。其次，是国际上的横向比较。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陷入低潮，易帜的许多国家政治动乱、经济滑坡、人民生活水平骤然下降。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却经受住了国内外政治风波的严峻考验，呈现出一派充满活力与兴旺的景象。特别是1992~1996这最近的5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12.1%，远远高出同期世界经济

年均约 2%（其中发达国家为 1.8%，发展中国家为 5.4%）的增长率。据世界银行公布的资料，1996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的排名，已从 1991 年的第 10 位上升到第 7 位，在发展中国家的位次则上升为第 1 位。粮食单产比改革开放前提高了 80% 以上，水稻、小麦、玉米三大作物单产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 26%~51%。钢产量于 1996 年首次突破 1 亿吨，居世界之冠。发电量在世界排名从第 4 位上升到第 2 位。我国吸纳外资最近连续 4 年在发展中国家中居首位，在世界居第 2 位，仅次于美国。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储蓄存款也大幅度增加。5 年来，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的增长率，是历史上增长最快的时期；农民年纯收入年均增长 5.7%，农村贫困人口从 1992 年的 8000 万减少到 1996 年的 5800 万，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下降到 6%~7% 左右。经过 5 年的发展，我国综合国力在世界的排位已从 80 年代的第 11 位进入世界六强。香港回归祖国怀抱和我国外交新局面的全面开创，更进一步地提高了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威望。可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 20 年，特别是最近 5 年，堪称我国建国以来最好的历史时期。马克思有句名言：“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①我们完全有理由说，邓小平理论指导的改革，则是当代中国历史的火车头。事实说明，邓小平理论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新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惟一正确的指导思想，是中华民族伟大的精神支柱。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这是党从历史和现实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

在当代中国，为什么邓小平理论成为唯一能够解决我们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问题的科学真理呢？这是因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硕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我们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构成这个“新阶段”的标志，就是十五大报告中所精辟地深刻地阐明的四个“新”，即：第一，邓小平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第二，邓小平理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第三，邓小平理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进行正确分析，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第四，总起来说，邓小平理论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它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哲学基础，以“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为中心而展开，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这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又是需要从各方面进一步丰富发展的科学体系。它指导我们党制

定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全方位的方针政策，为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新的强大思想武器。

“旗帜问题至关紧要”。旗帜问题本质是党的指导思想问题、精神支柱问题，因而总是同方向道路问题、同革命和建设的成败进退、同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问题紧密地联系着的。从我们党历史看来，当党诞生并举起马克思列宁主义这面伟大旗帜之后，中国革命面貌就焕然一新。当党的七大确立和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这面伟大旗帜时，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有了正确方向，并向外界展示了以解放区为雏形的未来新中国的光辉形象。现在，党的十五大确立和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这面伟大旗帜，指明了我们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向前推进的坚定方向，向人民和世界展示了我们党和国家坚持改革开放的光辉形象。邓小平生前极其重视这个方向和形象问题，并生动地指出“这是向人民亮相啊！”^②当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政治风波和重组党中央领导班子时，邓小平反复强调：“组成具有改革开放形象的中央领导班子，使人民放心，这是取信于民的第一条。”^③“无论如何要给国际上、给人民一个改革开放的形象，这十分重要。”^④他对几位中央负责同志亲切地说：“中国一定要有一个具有改革开放形象的领导集体，这点请你们特别注意。”^⑤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国际风云变幻，一股“制裁”中国的逆流以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动乱和易帜相继出现的严峻时刻，邓小平一再提醒全党：“现

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⑥“现在的问题不是苏联的旗帜倒不倒，苏联肯定要乱，而是中国的旗帜倒不倒。”“这十年的成绩哪里来的？是从改革开放得来的。中国只要这样搞下去，旗帜不倒，就会有很大影响。”^⑦“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⑧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又进一步号召全党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否则“只能是死路一条”。这一切说明，把旗帜问题同党和国家的方向、形象问题和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问题紧密联系起来，这本身就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内涵。正是在这个“至关重要”的旗帜问题上，江泽民同志的多次讲话和十五大报告对邓小平理论做了新贡献。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十五大把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作为自身的主题和灵魂，并强调指出：“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不动摇。”“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用邓小平理论来指导我们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这就把党的理论权威同政治权威、组织权威高度结合起来，从而确保全党在邓小平逝世后对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更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具有高度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这是我们全面夺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更大胜利的根本保证。

坚定不移地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是党从历史和现实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但是，国内外有人把邓小平理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认为我们树立和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就意味着丢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种看法当然是错误的。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正确指出：“在当代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坚持邓小平理论，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为什么说邓小平理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呢？我们从以下四个“一”就可以获得清晰的认识。

其一，同一个“精髓”相互贯通。

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实事求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创立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无产阶级和一切进步人类提供了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中，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工程。他用“实事求是”这句中国成语，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加以简明的概括和阐发，创立了我们党的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而不是从主观愿望出发的思想路线，带领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

部冲破主观主义（主要是教条主义）的严重束缚，将中国革命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毛泽东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客观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毛泽东还指出：“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惟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能够引导我们民族到解放之路。”^⑩这就告诉我们，毛泽东创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包括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这两个方面。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第一次革命的辉煌胜利，使中华大地上实现了继辛亥革命之后又一次历史性巨变，归根到底，就是靠毛泽东倡导的这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伟大革命实践中，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78年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讲话，作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发表的第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他带领全党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新时期。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则是在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中，中国面临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发表的第二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他号召全党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不动摇，深刻地回答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特别是冲破了所谓

“姓社姓资”问题的思想迷雾，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的阶段。邓小平前所未有地揭示了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一致性及其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中的重要地位。邓小平说：“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⑩这就清楚地说明，从“实事求是”这个理论精髓看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和相互贯通的。

其二，同在一个“结合”上狠下功夫。

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情况结合起来，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因为马克思主义揭示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对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进步人类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但是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实际情况和历史条件又有许多的不同点。如果不善于把这种“一般原理”同“具体实际”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就变成空洞的教条而丧失生命力，无产阶级政党也就无法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所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就说明对他们理论的实际应用，“随时随地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⑪本世纪初叶，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之时，在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同俄国实际结合的过程中，明确地指出：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⑫

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里进行革命，遇到的情况和问题是十分复杂和特殊的。对中国共产党

人来说，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本国的实际“结合”，即学会“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⑧，是一项极其艰巨的历史重任。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日益结合的历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⑨但是，这种“结合”并不是一帆风顺和一蹴而就的。当我们党尚处于幼年阶段，领导机关还不大善于实行这种“结合”甚至在某些时候变“结合”为“脱离”的时候，中国革命就屡遭挫折，甚至陷入险境。在那艰苦卓绝的斗争岁月里，毛泽东从理论和实际上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实行这种“结合”的正确方向。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人，经过总结长期的历史经验，包括总结一些人因脱离实际、生搬马列本本的词句和外国模式而使中国革命屡遭挫折的惨痛教训，才成功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关于中国革命的科学理论——毛泽东思想。我们通常讲的中国“第一次革命”的伟大胜利，即把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革成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指引下实现的。

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同中国实际的结合，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发展的具体的历史过程。当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后，新的更伟大的革命任务，是要把中国由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变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革命的新实践、新任务，要求我们党进行新的

探索，实现新的“结合”。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我们党经历了艰辛的曲折的探索道路，其中有过成功的经验和成就，也有过严重的全局性的失误。毛泽东在1960年1月30日就说过：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⑤毛泽东提出的这项任务，正是由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接下来实现的。

邓小平作为毛泽东的战友，一贯高度重视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他认为毛泽东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句话本身就是普遍真理”。他指出，这句话“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叫普遍真理，另一方面叫结合本国实际。我们历来认为丢开任何一面都不行”。如果丢掉了“普遍真理，不实现社会主义，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就不能存在了”。但是，如果“离开本国的特点去硬搬外国的东西”，“普遍真理就不能实现”。邓小平还强调指出：“不论在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如何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这是一个需要不断解决的问题。”^⑥当然，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二者的结合和结合得好，关键环节是搞好调查研究，从本国的国情出发。因此，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不辞劳苦，到国内外许多地方参观考察，调查研究，不断总结群众的经验。他所反复思考和着力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准确地、牢固地把握住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结合起来。他多次讲过：“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④“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⑤邓小平理论正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十五大报告在总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和谈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者的关系时，精辟指出：“中国共产党是非常重视理论指导的党。中国人民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我们党把它称为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